

TIANYI PAVILION

SERIES 第三辑

天一阁文丛

天一阁博物馆 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一阁文丛. 第3辑 / 天一阁博物馆编.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743-034-6

I. 天... II. 天... III. 藏书楼—文集
IV. G258.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7718号

天一阁文丛 (第三辑)

天一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社址邮编: 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

印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743-034-6/G·10

定价: 30.00元

《天一阁文丛》编辑委员会

顾问

- 任继愈 著名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
- 毛昭晰 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原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物局原局长
- 来新夏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 傅璇琮 著名出版家、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
- 骆兆平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天一阁文保所原所长

主任

- 柴英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编委

- 王子舟 王世伟 邓洪波 韦力 艾思仁(美) 沈津(美) 邬向东
陈宁雄 岡雅彦(日) 孟建耀 贺宇红 姚伯岳 徐良雄 徐建成
徐雁 袁芳芳 袁逸 袁慧 高桥智(日) 章国庆 龚烈沸 董贻安
程焕文 虞浩旭

主编

- 虞浩旭

编辑

- 饶国庆

目 录

访谈

智者之香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谈天一阁 李文昌(001)

探索

从“行秘书”到“两脚书橱”

——余姚人藏书精神刍议 施长海(005)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 陈德弟(015)

海宁藏书家之传承及其姻亲关系初探 虞坤林(027)

“天一”意蕴初探 桑良至(033)

苏州的书斋文化 虞 江(037)

江南私家藏书与乾嘉学者 马 杰 石明芳(044)

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与中日律令制度 虞浩旭(050)

论说

吴地重镇的刻书及其特点 曹培根(054)

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 童银舫(063)

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海源阁 田金茂(068)

近现代香港、澳门藏书家的崛起	骆伟(073)
再谈近代湖北四位藏书家	刘作忠(081)
应载史册的一些私家藏书楼	范凤书(088)
孙毓修小绿天藏书及其书目	柳和城(093)
苏州古代寺院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马杰(100)
苏州徽籍藏书世家	王璞(106)
浙江图书馆馆藏家谱概说	丁红(113)
天一阁的藏书构成及思考	魏海波(123)

关注

论历史文化名城与图书馆	王子舟(129)
读者对《文献家通考》如是说	郑伟章(141)
省视都市精神 弘扬人文传统 ——《城市文化丛书》众人谈	(154)

人物

明朝苏州状元藏书家吴宽	马亮(168)
书痴狂生惜丰坊 ——写在明代著名书法家丰道生逝世 440 年之际	袁良植(174)
查慎行的抄书诗	顾志兴(188)
从《黄侃日记》看黄侃的读书与买书	任相梅(190)
时代变迁与私家藏书 ——以黄裳《来燕榭读书记》为例	宋萍(199)
施廷镛先生与《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 ——《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校后记	李雄飞(207)
遼谷谈往学不厌 枫林唱晚且填词 ——由遼谷老人随笔说来新夏先生	徐雁(214)

考证

- 由南雷题诗兼述天一阁东南两园之闻氏 闻一波 (220)
- 万季野《历代史表》版本及天一阁藏稿本考略 俞信芳 (225)
- 绍兴徐氏兄弟藏书考
——兼辨析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的一段史实 郑伟章 (230)
- 中古颂文系年 郭宝军 (242)

忆往

- “我奇铅石自中华”
——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书后 秋 禾 (256)
- 古荆州淘书记 黄道华 (262)

赏评

- 《翁同龢文献丛编》的史料价值 仲伟行 (265)
- 总结百年旧书行业 弘扬华夏旧书文化
——《中国旧书业百年》读后 吴永贵 黄镇伟 (272)

交流

- 我的淘书经验 张舒展 (276)
- 关于天一阁讲解员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张 波 (280)

发现

- 揭开隔山溪隐庄面纱 谢国旗 (284)

序跋

- 《浙江藏书史》序 傅璠琮 (290)
- 《中国私家藏书研究丛稿》序言 来新夏 (294)
- 《中国文学史》说明 来新夏 (296)
- 重印《四明丛书》序 骆兆平 (299)
- 后记 (302)

智者之香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谈天一阁

李文昌

“智者之香”是虞浩旭研究员一部著作的书名,记者甚是喜爱,便照搬了过来。虞浩旭是天一阁的“老人”了,从古籍研究部主任、副馆长一直干到现在的馆长,同时还是市政协委员。不过,你不要误以为他是一位鹤发银须的老者,其实,他才届不惑之年。土生土长的虞浩旭,有着南方人少有的身高,这虽然增加了他著作等身的难度,却无法阻止他走向成功的步伐。方正的国字脸上,是一副褪了色的金丝眼镜,睿智的眼神中,常常透出一分笑意。对于天一阁,虞浩旭有着很深的感情。

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是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它创建于明嘉靖年间,创始人范钦,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天一阁以收藏孤本、抄本、金石碑刻和明代文献而著名,藏书盛时达7万卷。清修《四库全书》时,曾进呈图书641种。天一阁藏书楼以其“天一地六”的独特形制成为众多官私藏书楼的范式,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1982年,天一阁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一阁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是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天一阁博物馆是以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而建立的藏书文化专题博物馆,也是国内惟一的藏书文化专题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示区组成,以所收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享誉藏书界。天一阁博物馆现收藏古籍文献30余万卷,计22542部147847册,其中善本孤本4974部29896册;历代字画4404件,其中一级品22件;器物类藏品共计62169件,其中一级文物33件、二级文物95件、三级文物1019件;新编地方志12000余册。馆内现有天一阁发展史陈列、中国现存藏书楼陈列、中国地方志陈列等基本陈列。

打造藏书文化“四个中心”

虞浩旭长期在天一阁工作,一直致力于藏书文化研究,也一直在思考着天一阁的未来发展。自担任副馆长、馆长以来,虞浩旭从博物馆的性质和功能出发,从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收藏文献资源的特色出发,明确提出了通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把天一阁建设成藏书文化的“四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一是中国特色文献收藏中心。天一阁博物馆有古籍珍本藏书30余万卷,其中珍槧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为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的收藏中心。它又是浙东地方文献集中之地,为地方文献的收藏中心,同时还是区域性的家谱族谱收藏中心。如今天一阁更是赓续传统收新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出版的地方志,90%以上都能在天一阁找到。全馆总计收藏各级各类地方志万余册,是全国收藏新编志书的南方收藏中心。天一阁决心在私家藏书楼的基础上,继续做好特色文献的收藏工作,成为特色文献的收藏中心。

二是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中心。紧紧围绕藏书文化研究这一核心,办好“一刊一社一基地”。即以学术刊物《天一阁文丛》为平台,吸引全国藏书文化研究者关注天一阁,关注藏书文化,促进学术交流;充分利用天一阁品牌的优势,筹建天一阁出版社,加大对阁藏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藏书文化、古籍类图书的出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共建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基地。同时通过制定《天一阁研究大纲》和《课题研究管理办法》、《学术研究奖励办法》等措施,营造学术研究的浓厚氛围,促进藏书文化的研究。

三是纸质类文物科技保护中心。2004年,由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博物院联合研制的南宋经折加固材料与修复工艺正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鉴定,新型FC-100纳米胶液成为我国纸质文物修复、加固的又一位“保护神”。作为以收藏古籍等纸质类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天一阁决心加快纸质类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建设,通过培养和引进人才,通过与国内相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在继承优秀的传统修复方法的基础上,争取在科技保护方面有新的突破。

四是藏书文化交流中心。天一阁博物馆将努力办好作为交流中心重要载体的《天一阁文丛》,聘请国内外权威人士为顾问和编委,为藏书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目前《天一阁文丛》已出两辑,在业内引起了良好反响。天一阁还将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现有陈列,突出藏书文化这一主题,使之成为藏书文化展示、宣传、交流的一个窗口。天一阁还将通过举办高层次的“天一阁论坛”和国际国内研讨活动,使天一阁成为藏书文化的一个信息资料的集聚之地。

为实现天一阁博物馆“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天一阁开始了新书库的建设。新书库包括2700平方米的收藏用房和900平方米的辅助用房,集研究、保管、阅览、管理诸多功能于一体,将充分满足文物保护工作各方面的需要。

加强藏书文化研究

图书的搜集、鉴定、校勘、品赏、典藏、管理以及题跋、评点、收藏等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又是其他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藏书文化的形成,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所以说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

中国的藏书文化博大精深,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学术史关系也极为密切。宁波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地,对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现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共两次研究热潮。涌现出了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天一阁藏书考》,许珪生的《古代藏书史话》,李希泌和张椒华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等代表性学术著作。

谈起藏书文化,虞浩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举手投足之间,更透出一分儒雅。

1996年,宁波举办了“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不仅进一步确立了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和世界图书馆史上的地位,而且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出版了论文集《天一阁论丛》,并直接催生了荣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藏书通史》,这又是“一部拓荒之作,填补了中国藏书通史的空白”。2003年,天一阁举办了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期间举办了“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出版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2004年,举办了第二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推出了每年两辑的学术性刊物《天一阁文丛》首辑,为藏书文化研究提供了平台。同时,近年来又有《天一阁丛谈》、《书城琐记》、《历代名人与天一阁》、《范钦评传》、《娜嬛福地天一阁》、《天一阁藏书史志》等著作相继问世。

2006年是天一阁主人范钦诞辰500周年,是天一阁建阁440周年,天一阁将以“双纪念”活动为核心,以学术研讨、陈列展示、编辑出版三大板块为抓手,启动天一阁原藏古籍寻珍合作计划,继续办好第三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届时将举办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出版《天一阁珍藏系列》、举办“中国藏书文化陈列”和“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晋京展”等十余项活动。

天一阁不仅要作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领头羊,还将在世界藏书文化研究和古代藏书楼保护上起积极作用。天一阁正积极与古代藏书楼保存情况较好的日本、意大利等国联

系,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为藏书楼的保护和藏书文化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虞浩旭以总结性的语句结束了本次采访。已经失去光泽的金丝眼镜后面,记者看到的,不仅是信心,还有一份真诚。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文物报)

从“行秘书”到“两脚书橱”

——余姚人藏书精神刍议

施长海

余姚藏书文化在江南地区可谓源远流长。余姚最早的藏书记载可追溯到1500多年前南朝宋虞愿眠备上“有书数僊”^[1]和南朝齐虞和“舒被覆书”的事迹^[2],这在宁波地区是最早的。宋元时期藏书文化得到初步发展,至明清达到鼎盛。宋以前以虞氏家族和林鼎藏书为主,由于年代久远,藏书事迹非常概略甚至不可考究。宋元时期赵师龙、孙介、李必达、张元鼎、茅宗愈、高似孙、高翥等人有藏书,大多不明是否有藏书楼,仅知张元鼎有风雨斋藏书,高翥有信天巢藏书。明清时期藏书事迹比较详尽,主要藏书楼有赵抃谦考古台、孙氏七千卷楼、吕本御书楼、诸九徵半草堂、谢氏丛桂书院、黄宗羲续钞堂、诸来聘昌古斋、吕章成蓼园、黄澄量五桂楼、曹辛雨书屋、景辉东白楼、吴以照晚香楼、朱兰四明阁、黄炳屋留书种阁、谢光甫永耀楼及卢文弨在杭州的抱经楼等。藏书楼未明的藏书家有孙钜、吕天成、邵曾可、高士奇、陈仪一、邵晋涵、诸成亮、郑雍谷、丁履泰、邵叶槐等。其中藏书楼五桂楼和四明阁保存至今,分别成为省、市文物保护单位。纵观余姚藏书历史,虽然大藏书家和大藏书楼不多,但藏书活动相当普遍,藏书种类相当繁多,已经形成了余姚人独特的藏书精神。

一、珍爱文献,雅俗并收

余姚藏书家珍爱文献,嗜书如命。南朝宋虞愿除了藏书,别无他财,当时褚彦回拜访虞愿,“见其眠备上积尘埃,有书数僊。彦回叹曰:‘虞君之清至于此’”^[3]。南朝齐虞和“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4],情愿被子淋湿而不敢让典籍受湿,其宝书之心感人。而清黄澄量终日与书为伴,甚至晚上睡觉也离不开书籍。他在《书睡》诗中说:“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蹉跎。”图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有的藏书家以抄写图书为业。如隋虞世基“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5]。而更多的藏书家自己抄录自己收藏。如五代寓居大隐的林鼎,“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6]。宋以后随着雕版印刷和册页装书籍的推广,购买图书相对容易,余姚藏书家便手抄与购置并用。南宋孙介“家贫无书,自诸经正

义、诸子书、战国策、两汉晋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闻杂说，悉手抄，或摘其要语，楷书细字，无点画颓惰”^[7]。南宋茅宗愈“经史百氏，细字手抄”^[8]。清黄澄量“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纪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龠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括无遗”^[9]。清谢光甫在上海“搜罗三十余年，所收以清人集及参考书为多，亦有宋本精抄本多种”^[10]。“他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11]。而清黄宗羲更是一生抄书、购书。年轻时与许元溥、刘城诸人约建“钞书社”，后建藏书楼名以“续钞堂”。他“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淡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晚年“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12]。他抄书不但勤苦，而且讲究办法，“寒夜必达鸡鸣。暑则拆帐作孔，就火通光，伏枕摊编，以避蚊嘬”^[13]。所以其子黄百家《明文授读》卷首写道：“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极多，皆先遗献假于各藏书家以抄得者。”有时见到好书却一时无法购置，黄宗羲便切切挂心。他在浯溪讲学时，曾去看吴兴藏书家曾宏所藏十余麓宋代野史，欲购未得，至晚年不忘：“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有时为了购置好书，不免发生争论，甚至师友交恶。清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记载了明清之际藏书家黄宗羲和吕留良因书绝交的经过：“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则用晦所授意也。”

正因为对图书具有宝爱之心并充分认识到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所以余姚藏书家即使历经坎坷，对藏书事业也矢志不渝。黄宗羲处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一生斗阉党、赴国难、避追捕、事著述、拒征召，真是“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他认定“国可灭，史不可灭”^[14]，藏书事业“搜罗大江以南殆遍”^[15]。清黄澄量不但“截缣以购，鬻产而求”，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为当朝统治者所不容的文化遗产，其五桂楼收藏由诸如绶整理的黄宗羲《明文海》总目四卷。该总目与四库本比较，篇目多1000余篇，而这1000余篇包括“夷夏之防”“敢为异论”的张居正、李贽等人的作品，都是清统治者认为“抵触本朝之语”的文章。同时，黄澄量还仿照《明文海》体例编著了《今文类体》，选辑大量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明代诗文、奏议等文章，分成17类，汇录成册，其中的400多家明代文集奏议，史料价值更是非同一般。

在收藏对象上，余姚藏书家比较开放，一般兼收并蓄，雅俗并重。有重在经史子集四部的传统藏书者。如明孙鑛“喜储藏四部，甲于姚江”^[16]，“而无异本”^[17]。也有“余姚为文献名

邦,藏书家多蓄异本”^[18]。如明吕天成别具识眼,收藏戏曲剧本达500余种,突破了鄙薄民间文学的传统观念。清黄宗羲进一步指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19]他不仅藏有当时几近湮没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等精品,而且藏书数量众多。其子黄百家在初编《续钞堂书目》序文里说:“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其书目除四部外,另列经济、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数算、小说、杂技、野史、释道、俳优等类。“天下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20]。据《居易录》记载,黄宗羲曾让学生利用所藏的汉、唐、宋、元以来诸儒经解,“删其烦复,著其异同,将勒成一书”,不料仅就《春秋》的“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大帙,考虑到不可能作成只得罢手。从中可见其收藏的诸儒经解是多么丰富。庶吉士杨中讷说黄宗羲家藏有可作史料用的宋人说部达300余种。但遗憾的是他对小说、词曲仍有误解,把它们与“时文”、“应酬代笔”并列,晚年时甚至要求“已刻者皆追板烧之”。还有众多余姚藏书家在雅俗并收的同时,形成了一定的收藏特色与独特价值。如南宋高似孙的砚石,清高士奇的书画,清郑雍谷的印砚,清景山的古今碑帖,清景辉东白楼“壁间粘远近名人佳什,篆八分真草、黄白五色笺几满,时号为诗藪”^[21],清曹辛“自群经诸子至西方国家之天文数学图书,不下数千种”^[22],清谢光甫藏有明嘉靖刻《吾学编》、万历刻《盛明百家诗》等精品^[23],以及清邵曾可收藏姚江书院派文献,清黄澄量五桂楼和黄炳堃留书种阁收藏黄宗羲的重要著作等等。

二、藏以致用,明心治学

清黄宗羲说:“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24]余姚藏书家历来注重书籍的效用,把藏书和修身养性、阅读品味、学术研究、获取功名等结合起来。所以虽然藏书活动大多分散零藏、聚散频繁,但普遍存在着浓厚的耕读家风和尊崇文献民风。

余姚藏书家对于个人修养要求很高,自律甚严。南宋高翥自题诗中说:“信天巢小仅容身,中有图书障俗尘。不与世争闲意气,且随时养老精神。”这反映了他超脱尘俗涵养精神的意趣。明赵搢谦教导学生:“寡欲以养其心,观止以明其理,调息以养其气,读书以验其诚,圣贤之域不难到。”^[25]他认为读书具有“验诚”的功用,是成为圣贤的必备条件。清诸来聘的昌古斋藏书万卷,他“与诸同志讲习其中,觥觥以名义相淬砺”^[26]。

余姚藏书家注重藏读结合。五代林鼎“比及中年,夜读书必达曙”^[27]。清胡德辉“平生除古书名帖而外,无一嗜好”,所以“独处一楼,自题曰‘书瘾’……又新居,或就别室,颜曰‘读书便佳’”^[28]。余姚藏书家有的阅读广泛,如南宋茅宗愈“早夜苦学……务博涉”^[29]。有的阅

读专精,如清黄宗羲的阅读内容重在史学和当代文献,22岁时“发愤读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铅矻矻,不毕不寝”^[30],在学术著述中又大量阅读,如编写《明文海》历时25年,“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31]。有的书本学习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如清黄炳垕藏书楼留书种阁的顶层“设星亮台,卧床对空,用玻璃设窗,直透天象”^[32],自称“晤对古人书万卷,测量天度夜三更”^[33]。余姚藏书家无不感受读书的无穷趣味,所谓“无涯身世事,有味圣贤书”^[34],“读书意未已,悠然有余欣”^[35]。即如夏天蚊蝇肆虐,他们也有对付的妙法。清曹辛“暑夕轩两瓮案下,插脚瓮中以避蚊”^[36]。这与黄宗羲抄书时的“拆帐作孔”可谓是避蚊双绝了。可怕的只是图书本当可读而未及读。清黄宗羲在顺治七年(1650)见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凡余所欲见者,无不在焉”,就相约一起闭关读书三年,可惜尚未践约而绛云楼焚毁,令他痛惜万分。

而藏书与治学的结合,早在余姚藏书的发轫时期虞氏家族身上就体现出来。据史籍统计,自三国到唐初,虞氏家族有20余人63种2000多卷著作,另有《集》8部75卷,唐虞世南更是被唐太宗誉为“行秘书”(意为“活动图书馆”)。《中国藏书通史》称:“知识的吸收要凭借典籍,虞世南家中定富藏书。惜史料无载,今已不可详考。”^[37]这话也同样适用于整个虞氏家族的藏书治学状况。唐宋以后,博取功名成为余姚藏书家的又一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唐以后余姚有进士671人,其中明代更多达387人,占当时全国进士数的1.6%,出现了1家四世进士,4家三世进士的盛况。明时,王阳明把“成德”与“精能”结合起来,提出“致良知”学说,给当时僵化的程朱理学以巨大冲击,在明中后期风行全国,远播海外。阳明学说后来分化成七派,其中浙中派主要在余姚和绍兴。清初又有黄宗羲开创浙东学派,关注“治乱兴废”“世道人心”,既重现代,又尊文献,于是“浙东史学,遂皎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38]。随着这两个学派的相继兴起,余姚藏书事业也进入全盛时期。余姚民众普遍重视藏书读书。如北宋某氏“虽治生业,而颇好看书,即其所居之西偏建室宇聚经史,求良师教诸子,俾朝夕修习于中”^[39]。南宋孙夫人以购置杭州国子监图书数千卷为嫁妆^[40]。清梅津草堂“堂之中,几一、榻一、酒瓮二、书千卷、笔数十员,苍髯叟颓然其间,醉则挥桐君写吾郁,醒则手丹铅、甲乙往古人物”^[41]。难怪清张岱在《夜航船》中感叹:“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业贱工,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藏书家更是潜心学问,并有一定的著述。南宋孙介与其三个儿子经常考究学问,他的《欣欣篇》诗写道:“幸哉得三男,父子聊自欢。烂舌不令闭,濡毫无使干。”著有《雪斋野语》、《烛湖集》附编等作品。南宋高似孙家有玉峰堂藏书寮,他自幼熟读典籍,著有众多目录学著作,除《经略》、《集略》、《诗略》等已经散亡外,传世的尚有《史略》6卷、《子略》4卷、《纬略》12卷、《骚略》3卷、《蟹略》4卷。他注重考辨和学术源流的梳理,在体例上兼叙录与辑录为一体,具

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另有著作《续古集》25集、《遗稿》1编、《文苑英华钞》4卷、《砚笈》4卷、《文选句图》1卷、《目录》1卷、《刻录》1卷、《烟雨集》等。南宋高翥著有《菊圃集》12卷、《菊圃小集》1卷和《信天巢遗稿》。明赵搢谦年轻时广交名士,潜心学问,洪武十二年(1379)被朝廷特征参与纂修《洪武正韵》,后在家乡筑“考古台”,有诗形容自己的研究生活:“文字声音叹久讹,十年辛苦费研磨。认云沈约知音甚,未许扬雄识字多。鱼鲁从今堪辨析,鼎鼐由昔费摩挲。总怜朋旧微钟子,归卧云山看薜萝。”^[42]。著作有《六书本义》12卷、《声音文字通》100卷以及《易学提纲》、《学范》、《历代谱赞》、《造化经纶图》、《周易图解》、《南宫续史断》、《童蒙习句》、《南游经咏集》、《考古余事》等计18种300余卷。明孙鑛精通经史书画,著有《绍兴府志》50卷(与张元汴合编)、《评经》16卷、《书画跋跋》16卷、《今文选》12卷、《评史记》130卷、《评汉书》70卷、《韩非子节钞》2卷、《翰苑琼琚》12卷、《坡公食饮录》2卷、《居业编次编》9卷、《排律辨体》10卷等。其中《书画跋跋》被《四库总目》称誉为“所论时有精理”,“亦赏鉴家所当取证”。清诸来聘“构昌古斋,藏书万卷。与符如龙、诸如锦、周肇修诸奇士结社,互相砥砺,名动四方”^[43],著有《精思楼诗集》。清邵晋涵私淑王守仁、刘宗周和黄宗羲,精通史学,兼长经学训诂。他人四库馆负责史部,所撰《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持论公允,多有创见。所辑薛居正《旧五代史》,采自《永乐大典》,兼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并参考《通鉴长编》及宋人说部碑碣等,使薛史与欧阳史并传后世,开创了清代辑佚之风。著作有《旧五代史考异》、《宋史考异》、《南都事略》、《史记辑评》、《皇朝大臣谥迹录》、《尔雅正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方輿金石编目》、《南江诗文钞》、《辘轳日记》等。清高士奇受康熙帝机遇,利用自己藏书和宫廷藏书进行学术研究,著作有《松亭行纪》、《扈从东巡日记》、《扈从西巡日记》、《塞北小钞》、《扈从纪程》等与康熙有关的随扈作品,以及《金鳌退食笔记》2卷、《天禄识余》2卷、《左传纪事本末》53卷和《江村销夏录》、《清吟堂集》等。其中《左传纪事本末》创新体例,对史实进行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并于篇末进行史事评论。《江村销夏录》是鉴赏书画的题跋专目著作,体例完备,记述详尽。清景辉“好聚书,建东白楼,积书至数万卷。尤长于诗,与陈梓、汪鉴、谢秀岚相唱和,世比之商山四皓。著有《惩羹录》、《兰心编》、《海村风俗记》、《东白楼文集》”^[44]。清卢文弨校勘与纠谬兼治,校是非与校异同并重,以对校为主要手段,并灵活运用他校、本校、理校等方法,强调不轻易改动正文,处理异文“相形而不相掩”,既注重字句讹、脱、衍、倒及错简的订正,也留意篇第行款原貌的恢复。其校本有《经典释文》、《逸周书》、《左传》、《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等达250多种,都以“精美”著称于世,著作尚有《群书拾补》、《钟山札记》、《抱经堂论文集》等。清黄澄量“笃志力学,于书无所不窥”(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著有《姚江书画传》、《四明耆旧传》、《四明记游钞》、《明文类体》及《五桂楼书目》等,其中后两书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清黄炳堃继承先祖黄宗羲、黄百家研究自然科学的家风,“其学以切实为真宰,无取乎杳渺

之浮谭,故著述成书独具过人之识”^[45],他实测《余姚县经纬度分开方积里图》开创了我国测绘学的新纪元。其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有《测地志要》、《交食捷算》、《麟史历准》、《方平仪象》、《历学南针》、《两太捷算》、《五纬捷算》等,文史方面的著作有《黄宗端公年谱》、《黄梨洲公年谱》、《诵芬诗略》、《黄梨洲公事实咏》、《黄氏世德盛赞》、《黄氏续录》、《黄氏三世诗》、《稀龄祝雅》、《耄龄酬唱》及未刊稿《焚余偶存草》、《竹浦草》、《蔚亭杂草》、《焚余存稿》等。当然,在所有余姚藏书家中,最大的学问家当数清黄宗羲了。正如郑性所评论的那样:“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46]黄宗羲一生“不事王侯持子陵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墓地望柱联语)。仅以《明文海》的著述来看,黄宗羲在大量抄录江浙著名藏书楼所藏明代文集和利用自己续钞堂藏书的基础上,于康熙七年(1668)59岁时选编明文,康熙十二年(1673)登天一阁阅书,康熙十四年(1675)编成《明文案》217卷。但他仍以为明代作者如林,犹恐有所遗漏,于康熙二十二年(1883)赴江苏昆山徐氏传是楼,“细检传是楼所藏明集,复得《文案》所未备者三百余家”(徐秉义《明文授读序》),最终编定《明文海》482卷。据统计,黄宗羲一生著作计112种,至少1300卷,2000万字,现存55种,1077卷^[47]。余姚藏书家的学术研究还有传承发扬和同志合作的事迹。最典型的当推《宋元学案》的撰写。黄宗羲晚年撰写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未完成而去世。儿子黄百家继承父业,但也未能完成。后来孙子黄千人邀请全祖望续写,但最后还是没有定稿。直到道光年间,慈溪人冯云濠和鄞县人王梓材利用“宋元儒文集不下百数十家”的醉经阁藏书,详校学案,才使《宋元学案》100卷最后定稿,并于1837年刊印面世。

三、嘉惠读者,书香流播

私人藏书搜罗不易,传藏更难,所以中国历史上多有秘藏吝借,藏而不用的藏书家。但余姚藏书家大多对自己的藏书采用相对开放的管理方法,允许读者阅览传抄,利用所藏进行刊刻印行,为余姚人才的培育和中华文化典籍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有的藏书家私藏公用,如清吴以照“藏书晚香楼,任人阅览”^[48]。清邵叶槐“藏书甚富,多载至署,与诸生谈经史,广所未备,士风丕振”^[49]。有的藏书家与同朋相切磋,如清黄炳堃“时与二三同志盘桓其中,郡邑长慕名而造庐者踵相接”^[50]。有的藏书家利用藏书训育后学,如清邵曾可“手钩玄要,常为后生开说,提撕本原”^[51]。而开放式管理的典型当属清黄澄量的五桂楼藏书。他自己“给一书,添一目,读一书”,还要求儿孙们共同学习,他认为:“子能读书,而后能教子孙读书,而子孙亦能教其子孙读书。是则尊公藏书之本意也。”^[52]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黄澄量还欢迎各地读者来五桂楼阅览,并刻印稿本资料赠送给朋友和学者,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地读者还免费提供食宿。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说:“余既构楼三

间以藏此书,益欲子姓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尝见世之谋子孙者,求田问舍,计非不周至。然数传之后,不免窳贫。重念赢金之教,此余藏书之本意也。”这就使五桂楼具有了初步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充分发挥了图书的实用价值,得到了无数读者的欢迎。清黄直奎《赠五桂楼主人药溪先生》诗赞美道:“羨君好书敌曹氏,我欲为君主书楼。羨君拥书等侯国,我欲为君校书郎。”当然,五桂楼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还不能出借。

余姚藏书家也不乏无偿赠送典籍的事迹。“破屋三间书五车”的南宋高翥在诗《谢人惠书籍》中传达出对友人赠书于他的快乐:“插架有时防鼠啮,藏家无力买香薰。不如随处堆床几,检阅时时似对君。”当清乾隆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采访遗书时,邵晋涵“尝进书四库馆,著录二部,列入存目三部”^[53]。而二老阁进呈的82种图书中,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于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清谢家兰幼而好学,因家贫几乎要辍学业,“同邑严氏资其书,以博览成业,四部所载,究悉其蕴”^[54]。

为了发挥藏书更大的价值和作用,余姚一部分藏书家还进行刻书活动。如清五桂楼刻虞世南《北堂书钞》、赵考古《六书本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思旧录》及医书《小儿药证直诀》等书。清黄炳堃的留书种阁也刻印图书。在被余姚梨洲文献馆收藏的部分留书种阁藏书中,发现有“同治癸酉秋刊留书种阁藏版”、“光绪己亥冬雕留书种阁藏版”、“光绪己亥雕留书种阁藏版”等字样。

为了藏书长存,书香永播,不少余姚藏书家在藏书建筑、家训等方面想尽了办法。以历时100余年的藏书楼五桂楼而论,创建者黄澄量把它设计成集藏书、讲学、编书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还立下“鬻与借人,即为不孝”的遗训。五桂楼屋顶呈“众”字形,有暗阁,可起到控制温度、湿度,防止雨水渗漏的作用,遇到紧急情况时又可把珍籍放到暗阁内,以防散失。楼上南面装有木板、玻璃、纱窗等三道窗,可防止图书受晒受潮。楼下作讲学和会见朋友之用。五桂楼的西侧建“爱吾庐”书屋(后扩建为五间,更名为“梦花书屋”),东侧建工匠雕板印书用的平房,另外建有厨房和家人居室。黄氏后人也能谨守祖训,努力传好五桂楼藏书。当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军浙东时,五桂楼藏书有所散失,黄澄量的孙子黄联鏢、曾孙黄安澜着力搜集散失书籍,购入善本,使五桂楼藏书得以恢复原有规模。再如清朱兰四明阁藏书楼,南临余姚江,遥对四明山,与居地中宪第相距约20米。建筑呈长方形,楼上四周开窗,翼角起翘。如此设计既便于防火,又便于观景,无疑是会友读书的好地方。光绪《余姚县志》记载朱兰晚年读书会友的乐事:“每集耆旧谈宴其中,一时称为香山洛下之比。山色江光,风帆沙鸟,遥瞻俯瞩,灵襟晒然,洵登临胜境也。”又如留书种阁藏书楼,黄炳堃把它建于居地西北,楼高三层,下两层藏书,顶层作观察天象用,这样藏书楼就兼有藏书和科学研究的双重功用。又在留书种阁中堂设黄宗羲像,题联道:“耄年终乙亥,距诞生小